美國近感

楊繼良

域外漫筆

去年年底一天收到此地社保（Social Security）機構發來的一封信，說是從今年一月一日起，我很可憐的一點社保金收入，將隨物價上升，調高百分之三點六，即調到每月四百六十二點九美元（此數比美國政府保障的要低很多，就不在這裡解釋了），扣除需要自付的藥品費九十九點九元，每月可以淨得三百六十三元。在我的記憶中，雖然物價在不斷上漲，但社保金已被凍結了一段時間，今年會調高，成了件稀罕事。於是，和在芝加哥的老同事通個電話。據那位大姐說，她還沒有收到這樣的通知；這次經濟危機以後已被凍結三年，前年年底曾收到過要調高的通知，後來追來一信，說是經濟未見好轉，那個通知不作數了，謹表道歉云云。所以提示我要有所保留，免得日後失望。

人們的認識，往往囿於個人見聞。我們這批上世紀八十或九十年代來美國讀書的人，除少數獲得「公費」或美國學校「全額獎學金」者外，絕大多數依靠非法打工謀生。我第一次「合法打工」，在一家規模比較大的超市，必須加入工會，工會每年與資方談判工資調高問題，並對資方解僱權有限制，員工退休也有養老保障。這使我對美國工會和社會主義式的福利制度特有好感。老伴（那時還不算老）畢業後在當地的公立大學任職，醫療和養老金等福利，都由政府保障。我們周圍來往比較密切的華人，都「讀書起家」，偏愛在政府或大公司任職、有保障，對於「生老病死」都沒有什麼牽掛。後來慢慢聽說，有許多企業（包括世界零售大王「沃爾瑪」）不允許工會存在，福利和保障都在減少，員工可以「揮之即去」了。聽老伴說，她的大學實行「新人新政策」，現在僱用新人時，說好福利減少甚至沒有福利。上述養老金凍結三年，只是一例，美國許多人的生活開始受到威脅。

時近去歲年底時，電視和廣播電台上關於窮人的節目多了起來。一位得了癌症又被解僱的婦女，頓時失去醫療保險，醫院通知不能繼續提供化療，記者問「這意味着什麼？」回答「等於是死刑判決」、那婦女淚流滿面，使人不忍卒看。我們這個只不足三十萬人口的小城，「無家可歸」、需要政府或慈善機構提供庇護所（shelter）者近年都在遞增，去年估計有四千人，看來只是百分之一，但再一想這些人可以坐滿上海萬人體育館的一半，報紙又報道目前槍枝業生意好……這一切都對年節的歡慶氣氛遮上陰影。上述的那位大姐在電話中說，她在飯店裡見到一位學生模樣的白人小伙子，吃一客清湯麵、再加一碗白米飯果腹，使她有一種說不出的難受。這一切都和中國或香港的大學生們對聖誕的認識限於「大餐」、「派對」的歡樂氣氛，格格不入。當然，美國人沉浸在歡樂之中的也多。

我早已退休，家中靠老伴維持生計。我們談到，她現在也不再有「物價調整」，但我家和周圍的同胞，似乎都沒有生活受窘的情況。她說，隨着工作年限的增加，我們這些盡量避免「跳槽」的同胞，都有些提升。加以按揭早早付清，開支少了。我們都按中國人的辦法生活，例如我們都在家自己做簡單的飯菜。上述白人小伙子那一碗清湯麵，在飯店花五元，如果買「熟泡麵」，至少可以買七包；大米，夠買八斤，可以三天不餓着。我們有一位找了個到中國旅遊的美國窮人「嫁」來此地的朋友，隨帶一個中學生的兒子，幾乎不會講英語，但她周末去餐館多打一份工，而且連聖誕節都從不休息。這樣，每月居然也掙三千美元，相當於美國人的中等收入，五年中獨力把兒子培養到大學畢業。「中國人有中國人的活法」，我同意她的結論。

美國如何走出困境，他們上層間爭論不休；中下層民衆遊行抗議仍未平息。由豐入儉難，更何況貧富差距拉大。瘦死的駱駝比馬大，經濟是會復甦的，但歲末年初低沉的氣氛，揮之不去。

在香港茶餐廳吃早點

崔琳潔

文化什錦

去年秋季，公司組織員工到香港旅遊。據說，香港有各種各樣的小吃，所以，旅行社不管早點，由大家自行享受美食。

我一個人漫步到了一家茶餐廳，服務生熱情地向我推薦了雞尾包。這種麵包看起來並沒有什麼特別，味道卻十分可口，我吃出了砂糖、椰絲等各種不同的味道。就像是一杯勾兌好的雞尾酒，又甜又香，味道很雜，卻又讓人回味無窮。我一連吃了三個。

這是用砂糖、吉士粉、椰絲攪成餡料，釀造的一種小麵包，價錢很便宜。做這種廉價麵包和吃這種廉價麵包的人，並不是貪圖便宜的草根人士，而是有情調的美食家，這正是這座城市的高妙之處。我讓服務生給我打包十個，作爲接下來幾天的早點。然而，服務生卻說：「這種麵包，只有當天吃才可口。」於是，我作罷。接下來，服務生又給我推薦了菠蘿包。把剛出烤箱的菠蘿包橫刀一切，加上冰冷的牛油，菠蘿包的熱力就將牛油激出撲鼻的香氣來。吃了一個後，我再次向服務生提出打包。然而服務生又說：「這種菠蘿包只有熱吃，才會香味溢口。如果菠蘿包冷掉了，裡面當做夾餡的牛油就有點膩口了。」

在這家茶餐廳，我一個早上吃了兩種可口的點心，每一種都讓我回味無窮。雖然最後在服務生的勸告下，我一個都沒有打包，但是我卻在這家茶餐廳看到了一種文化。對他們來說，多賣一個麵包、多掙幾兩碎銀，或許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對顧客的負責。而這正是這座城市的內涵和修養。一頓早點，在吃了兩種美味的同時，吃出了一座城市的內涵和修養，這才是最有價值的一頓飯。

回憶詩人的兩部專著

馬海甸

燈下集

俄羅斯大詩人去世後，其親人、摯友鮮有不撰寫回憶的，而且是不寫則已，一寫就是一部專著，詩人一生的社會背景，影響他（她）一生的重要事件，他（她）的一言一行、一顰一笑，對他（她）的作品的深度解讀，無不備載書中。這裡面最有名的著作，應數詩人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的遺孀娜傑日塔的兩部回憶錄。這兩部回憶錄如果沿用俄文原名的話，可以直譯爲《回憶一集》、《回憶二集》，但這樣的名字太普通了，很容易被混淆。美國翻譯家給另起了一個名字，名曰《沒有希望仍抱希望》及《希望被遺棄》。名字改得好，因爲「娜傑日塔」在俄文就是希望的意思，化平凡爲不凡，具見出譯者的匠心。

一集主要追述奧西普寫打油詩諷刺斯大林，因而被克格勃的前身帕格烏抄家、逮捕以至審訊、流放的故事，中間還穿插了詩人帕斯捷爾納克、阿赫瑪托娃爲之奔走求情，而奧西普在流放過程中精神分裂的一幕。奧西普先是被流放到小鎮切爾登，自殺不遂後，又被流放南俄的沃羅涅日，這期間，娜傑日塔一直不離不棄地緊隨其後。流放期滿夫婦倆一度回到莫斯科，但在大清洗高峰期詩人再度被捕，流放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以迄於死亡。二集主要環繞俄羅斯白銀時代阿克梅派詩人（奧西普是這一派的創始人之一）的命運，他們有的被詩友出賣，因而瘐死獄中，有的出賣詩友，因而苟存生命於亂世。回憶錄最後以娜傑日塔催人淚下的《最後的信》作結，其時奧西普早已離開人世。前些年，兩書陸陸續續有片斷中譯在各雜誌上刊出，去年也有出版社刊出了出書的廣告。據我了解，因爲版權問題，該書中譯本出版尚言之尚早。二〇〇九年，俄國有出版社出版了《回憶三集》，與前兩部不同，三集其實是零散文章的合集，有一部分文章不屬回憶錄，較難歸類，之所以取了這個名字，還是出於生意眼。

另一部值得一提的回憶錄是詩人瑪麗娜・茨維塔耶娃的妹妹阿納斯塔西婭（阿霞）・茨維塔耶娃的回憶錄。跟乃姐一樣，阿霞也是作家，寫有多部中短篇小說集，但她最有價值的作品還是這部回憶錄。回憶錄有三種不同版本，蘇聯時代出的一種篇幅最小（說小，其實是相對而言，因爲它也厚達四百餘頁），九十年代中再版加了整整一章。二〇〇八年擴大爲兩卷集，一千五百餘頁，扉頁上註明：「恢復刪節的權威版本」。這部回憶錄圍繞兩位女作家的父母展開（父親茨維塔耶夫是著名的藝術史家，莫斯科一家著名博物館的創始人，眼下俄羅斯已有人對他展開爲時稍晚的獨立研究），最爲人矚目的當然是對乃姐、譽滿世界的女詩人的回憶。在目前爲數多達十餘冊、觀點各異的瑪麗娜・茨維塔耶娃傳中，對其孩提、青年時代的研究，都以該書爲主要材料來源，其權威性可想而知。阿霞本人的遭遇，在蘇聯時代的自由知識分子中也頗具代表性，她本人在集中營裡度過漫長的歲月（順便說一句，她的小說大抵以此爲題裁），不幸中的大幸是，她仍得享遐齡（終年九十九歲），可以比較從容地把耳聞目睹的一切形諸筆下，這比她的外甥女、瑪麗娜的女兒阿里阿德娜，回憶錄才開了頭，就因心臟病發猝死而中輟幸運多了。

人人面對總結

鄺穎萱

自由談

年尾時候，最常收到就是電子賀卡，聖誕過後，接踵新年。由文字版到卡通短訊品種之多，總會有一兩條新設計的會叫你會心微笑。朋友甲傳來網上熱爆的段子：「千山鳥飛絕，都在寫總結；舉頭望明月，低頭寫總結；生當做人傑，死亦寫總結；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深處寫總結；送君千里終一別，回去還得寫總結；洛陽親友如相問，就說我在寫總結；但使龍城飛將在，看誰不敢寫總結；衆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正在寫總結。」

寫總結這玩意在內地是一個普通不過的年尾工作，意思是公司叫上班族作檢討回顧過去三百多天有什麼做得好需改進又或者來年計劃怎樣前進突破等。撇開忙碌了一年，還不能輕鬆的放假休息這點不說，要求員工寫總結的實質作用又是什麼，可以達到怎樣的目的才是重點。說到底就是總結寫過了，公司可會因爲大家交來的報告好好增值？如果你問我，答案很清楚：「不」！

原因簡單不過，一間公司的運作要待年尾才作檢討改進，用廣東話來說就是「蚊都剛，人都死！」這種寫總結從來不會在外國出現，就是由香港人當老闆的亦不會發生，有問題要改要變，公司頂多給你三天至一星期，還是搞不出一個方法，第二天回到公司，職員門卡已不能打開公司門鎖，閣下的私人物品早由公司保安部收拾好讓你領走了！再說，打工一族總會對公司管治方式或上級有意見，但誰敢大膽說出自己的想法，調侃自己沒問題，調侃老闆就是今天不炒你，都總會有風險吧！誰知道他何時心情不好便拿你來祭旗呢？打工智慧告訴我們「總結」不宜認眞，用走過場的形式主義處理最穩妥。

但在內地歲末鋪天蓋地的總結潮中，也有值得一讀的文章，韓寒在年尾冬至前總結了他對現階段中國政治發展的觀點，三篇博文題目爲《談革命》、《說民主》及《要自由》。韓寒的總結引起網民熱烈談論。

在《談革命》的文章裡，韓寒首先否定革命的正面意義，因爲國民素質低，一旦爆發革命，只會帶來混亂，最終得益者將是權術野心家，革命更不一定會帶來民主，受損最大的可能是中產階級。韓寒認爲大部分中國人「均以一副別人死絕不吭聲，只有吃虧到自己頭上才會嗷嗷叫的習性，一輩子都團結不起來」。中國人哪會爲了理想價值如民主、自由、公義而搞革命。

在第二篇《說民主》是延續談革命的主題，否定革命而走漸進改革，他認爲是與執政者討價還價的過程。文化人一直認爲只要改革體制，一切便迎刃而解，但韓寒認爲人民才是更根本的問題。他認爲中共「有八千萬黨員，三億的親屬關係，它已經不能簡單的被認爲是一個黨派或者階層了，黨組織龐大到一定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人民就是體制本身」，今天執政黨體制問題，也是人民問題，所以要改變就要從人民開始，而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最後一篇《要自由》則具體提出希望官方爲文化、出版、新聞、電影自由鬆綁。文化界與官方建立默契共識，不清算，向前看，不談過去敏感歷史問題，只討論當下社會現象。韓寒冬至三篇總結博文，有人認爲他走向妥協，亦有人認爲他變得務實，不再空談口號了。這樣總結引發的爭議，相信早在韓寒預計之中。

但凡事都有兩面，不管寫總結這玩意有多無聊多餘，甚或流於形式主義，現實是大部分人都不想做韓寒，只因槍打出頭鳥，但求呈交上司的總結不爲人所注意，寫了等如沒寫的走過場文章便算。據內地媒體報道，龐大的年終寫總結「市場」讓網店發現商機，於是紛紛推出代寫年終總結服務，代寫總結一般價格爲每千字八十至一百二十元，生意異常火爆。年終總結不重內容，總之在死線前交課便成，買來的作業，文風當然嗅得出有股山寨味，例如開首總是四字成語；如「光陰荏苒」、「白駒過隙」，又或是「回首過去一年，內心感慨萬千」，「是對自己的一種鞭策」，「人生能有幾回搏，在今後的日子裡，我們要化思想為行動，用自己的勤勞與智慧，描繪未來的藍圖」，「將大家扭成一股繩，積極配合，發揚協作精神」，再陳腔濫調再肉麻又有什麼關係呢，反正你的老闆很可能做同樣的事，在向上級做總結，更甚者你的山寨總結報告待至來年年尾還擱在文件櫃內未看呢！

雪壓冬枝（攝影）楊芳菲

熱心校務的哲學家

言止善

人與事

馮友蘭（一八九五至一九九〇）是我國現代最負盛名的哲學家之一，主要著作有《中國哲學史》、《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中國哲學簡史》等。和別的哲學家不同的是，他獻身教育的一生中，不但登堂講課，還做過許多教育行政工作。從他的大學教育的實務和教育思想來看，都堪稱當之無愧的教育家。他曾長期擔任清華文學院院長，清華大學曾有兩度在校長易人時遇到困難，他都及時地出任校務委員會主席，主掌危難之際的清華校務。他在西南聯大一直參與領導工作。抗戰勝利後清華復校，他也是一位主要操持者。一九四九年之前，清華大學在人文方面招攬了那麼名教授，培養出那麼多人才，是和馮友蘭的工作分不開的。記得季羨林回憶他去德國留學，其中便有馮友蘭的穿針引線。

馮友蘭何以會成爲一個「事功」的學者，這和他對哲學，特別是中國哲學的看法是分不開的。對於「哲學」這個多義詞，馮友蘭認爲，「我所說的哲學，就是對於人生有系統反思的思想。」「按照中國哲學的傳統，它的功用不在於增加積極的知識（積極的知識，我是指關於實際的信息），而在於提高心靈的境界——達到超乎現世的境界，獲得高於道德價值的價值。」他認爲，就境界而言，人生可以分爲四個等級：自然境界，如小孩子和原始人，只能順着本能或社會風俗習慣而行；功利境界，人已意識到要爲自己做事，其做事的效果也可能有利於他人；道德境界，人了解到社會的存在，認識到自己不過是社會的一員，已懂得要爲社會做事；天地境界，人了解到超乎社會的整體之上，還有一個更大的整體，即宇宙，人不僅是社會的一員，還應自覺地爲宇宙服務，成爲如孟子所說的「天民」。前兩種境界的人，是人的常態；後兩種境界的人，是人應當成爲的人。生活於道德境界的人是賢人，生活於天地境界的是聖人。按照中國哲學的傳統，哲學的任務是幫助人達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特別是達到天地境界。馮友蘭斷言：「中國的聖人是既入世又出世的。」據此，我們就不難理解這位哲學家何以會對繁雜的學校實務能投入如此飽滿的熱情。

在抗戰時期，馮友蘭寫了《新理學》等六本書，全面總結自己的哲學思想。在《新原人》的自述裡他寫道：「『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哲學家所應自期許也。」從中可以看出他的宏大抱負和深切願望。抗戰結束，西南聯大解散，北大、清華和南開都遷回北方，馮友蘭被公推為西南聯大撰寫紀念碑文，文中他濃厚的愛國情懷，殷殷的赤誠溢於言表：「我國家以世界之古國，居東亞之天府，本應紹漢、唐遺烈，作並世之先進，將來建國完成，必於世界歷史居獨特之地位。蓋並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國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解放之後，馮友蘭大部分時間在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文革」的北大是一個重災區，馮友蘭也不能倖免。特別是在「批林批孔」的日子，馮友蘭講過一些「趕時髦」的話，的確成爲讓人詬病的污點，馮在後期的文字裡對此有檢討。對馮的評價，學者李愼之有句很概括的話：「中國人了解、學習、研究中國哲學，馮友蘭先生是可超而不可越的人物。」

醃菜

李卉

飲食男女

舊曆年底，是一年醃菜時。對醃菜，我有着深厚的情結。

小時候，外婆是醃菜好手。歲末，家裡壜壜罐罐，被外婆像變戲法一樣，醃滿了白菜，這些大壜小罐，放置廚房一角，看着就溫暖。

一到雪天，窗外寒風呼呼，雪花飛揚，外婆總把手洗得乾乾淨淨，取出幾棵醃白菜，洗淨切好，放置炭爐上，和大腸或肉什麼的一起燉着，突突冒着熱氣，香氣慢慢瀰漫。這時，外公總溫壺燒酒，一家人圍擁一起，享受着快樂的晚餐。這就是我童年難忘的幸福。

製作醃菜，是件幸福和快樂的事情。瞅準晴好天氣，買上幾十斤白菜，這種白菜如同台灣故宮翠玉白菜，與北方人說的大白菜不一樣，北方的大白菜，南方人卻叫它黃心白。醃製白菜之前，將白菜鋪開，在陽光下曬上一天，再將整棵白菜洗淨，瀝乾水後，用粗鹽放入菜心，一顆顆整齊碼好，放在大缸裡。醃菜用鹽量最重要，用少了，白菜發酸而且保存時間短，用多了，太鹹，難以下嚥。

基本上，十斤白菜用一斤粗鹽。白菜放好後，再用大鵝卵石壓住，讓白菜醃出的水，淹沒白菜，隔絕空氣和白菜的接觸才可以。最後將菜缸放在避陽處，封好缸口，一個月左右，就可以開壜吃香脆的醃菜了。

醃白菜是南方人冬季主打醃菜，吃法很多，可以同蒜、朝天椒素炒，澆上芝麻油，是下飯的好菜。將醃菜切成細絲，和肉絲、紅尖椒絲爆炒，更是可口。更有不少人，喜歡將醃白菜切成長條，與鹵好的牛肉、大腸等，做成火鍋，和青蒜、紅辣椒、豆腐等一起燉燒，醃菜吸收了葷菜的香味，化解了葷菜的油膩，下飯下酒，那滋味更絕。

一碗醃白菜，在大魚大肉、山珍海味旁，一點都不怯弱，這些醃菜大大方方，登堂入室，憑的就是一種淡定，一種質樸，一種獨有的滋味。

屠呦呦獲獎「爭議」

余仁杰

如是我見

二〇一一年中國科技亮點之一，是美國拉斯克臨床醫學研究獎授予八十一歲的中國女科學家屠呦呦，以表彰她發現了一種治療瘧疾的藥物「青蒿素」，在全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挽救了數百萬人的生命。這是中國科學家首次獲得的國際醫學大獎，亦是迄今爲止中國生物醫學界獲得的世界級最高獎。

新華社去年十二月八日在綜合報道二〇一一年我國科技亮點的電訊中，當然把此列爲重點成就之一，但內中卻有「儘管在國內存有爭議」一句話，引起人們好奇：中國內地存有什麼爭議？其實，自從屠呦呦獲國際大獎的消息發布後，筆者早已聽到不少相關爭議：青蒿素在四十年中得不到國內公認怎會獲國際大獎？屠呦呦無博士帽子、無院士頭銜（最近新增兩院院士中仍無她的芳名）、無國家級獎項，「三無」身份怎可獲國際大獎？等等。可見此獎如果在國內評定，眞還輪不到屠呦呦。據悉，連新華社也公開說「國內存有爭議」，主要還是指青蒿素研發成功是「五二三」項目組集體功勞，似乎讓屠呦呦獨自獲獎「不公」。

在科學技術研究上一有重大發現或發明創造可評上獎，總強調「集體功勞」，獲獎要「人人有份」，這或許也是「中國特色」。它使筆者記起一件事：當年中國科學家首研「胰島素」成功，有國際友人要推薦申報給諾貝爾獎評委會，但申報的名單卻成了問題：用「項目組」集體名義不行，要列名結果列了九個人；但諾獎的每個獎項得主最多也只能是三人，最後當然只能失去被評選的機會。這次青蒿素獲獎也同樣遇上獎給誰的「爭議」，但新華社在報道中給出了答案：「美國拉斯克基金會認為，評獎關鍵看三個方面：誰先把青蒿素帶到『五二三』項目組，誰提取出有百分之百抑制力的青蒿素，誰做到了第一個臨床實驗。屠呦呦做到了三個第一。」於是決定獎給了她。

屠呦呦的獲獎，確實不是因爲她是該項目的科研組長（在「爭議」中也有人質疑是否因項目負責人而優先，因在中國的慣例中那些科研論文或成果發表時都把領導人署名放在先，即使掛名領導人也如此）。實際情況是：屠呦呦受命後，在艱難困苦的條件下，通過翻閱歷代本草醫籍，四處走訪老中醫……終於在二千多種藥方中整理出一張含有六百四十多種草藥（包括青蒿）的《抗瘧單驗方集》。接着把重點放在青蒿上進行動物實驗，然而效果又不出彩。青蒿同屬有多種，一般青蒿對治瘧無效，後屠選用黃花蒿（又名臭蒿），經過一百九十次失敗後，從東晉葛洪的《肘後備急方》中得到啓示：不能加熱，絞取汁。

終於在第一百九十一次低沸點實驗中發現了抗瘧效果爲百分之百的青蒿提取物。一九七二年，屠呦呦及其研究組人員從這提取物中提煉出抗瘧有效成份——青蒿素。這之中，她創造性地解決了四個問題——選用哪種青蒿、選取哪個部位、在什麼季節採摘、用什麼方法提取。一九九二年，針對青蒿素成本高、對瘧疾難以根治等缺點，她又發明出雙氫青蒿素這一抗瘧效爲前者十倍的「升級版」。

事實雄辯地證明，拉斯克獎確應獎給屠呦呦，問題在於與當年「胰島素」成果一樣，根據當時的規定，發表的有青蒿素研究的很多文獻都沒有署個人的名字，作者都是「協作組」，因而當屠呦呦獲獎便引起「爭議」。其實今天我們應該爭議的倒是：在科研事業上要不要按科學規律辦事、尊重科學家個體的發現發明創造？署名用關鍵科研人員的姓名，對我國科研事業的發展只有好處。